

■记者观察

# “让火焰再高些，再高些”

——东莞“新大众文艺丛书”观察

□本报记者 黄尚恩

作为一个现象，东莞素人写作已经被人们广泛谈论。但是，他们每个人写的是什么、写得怎么样，我们需要结合具体作品进行分析。近期，东莞市文联与花城出版社联合通过“全链条”式的培育模式，推出了“新大众文艺丛书”。首批作品包括温雄珍的诗集《在炭火上安居》、瑛子的非虚构作品《擦亮高楼》、曾为民的诗集《赶石头的人》、章新宏的散文集《从江右到岭南》、易翔的诗集《东莞时间》、沈汉炎的诗集《有些光不会消失》。丛书出版后，举办了首发式、研讨会和分享会等系列活动，为我们重新认识这批写作者提供了新的契机。

“我的这部诗集为什么叫《在炭火上安居》？在炭火上怎么可以安居呢？”温雄珍表示，越是不可能，我们越要去努力，让它成为一种可能，“我们可以在很不诗意的生活里找到诗意”。她的诗歌便是从这真实的生活现场生长出来的，诗集第一辑“烧烤架”与第四辑“短歌”充满了市井烟火与个体温度。温雄珍试图在生活的烈焰上构筑精神的安居之所。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汪政借用“绘事后素”的典故概括温雄珍这批写作者的特色。他认为，素人写作主要是“自言”的，写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但温雄珍们所拥有的不是白纸般的“素”，而是丰厚、充满质感的生命经历。她的劳作、她的家庭、她的挣扎与坚守，构成了其诗歌创作最坚实的“素底”。此外，她的写作除了“自言”的成分，也有“为他者言”的部分，这就体现了从“素”向“绘”的转变。比如，诗集的第二辑“焰火”开始触及饥饿、死亡、战争、命运等更具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宏大主题，第三辑长达数百行的长诗《迷宫》更是展现了她较强的思辨能力和整体架构力。

瑛子《擦亮高楼》里的很多细节，只有亲历者才能写出来。作为清洁工，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擦除“脚印”。瑛子说，劣质的胶鞋走在高温的地板上，容易留下脚印。有些脚印比较深，清洗掉就好，可有些脚印很浅，背着光的时候，不大容易看见它们，等太阳光一照，它们就现形了。对此，瑛子这样写道：“我根据经理发的照片寻找脚印的具体位置，乌桕树影斜射过来，完全看不见脚印，我只好等待阳光回来的时候，用粉笔确定它的位置，再做清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桦认为，瑛子在《擦亮高楼》中以质朴的文字记述了本真的自我和本色的生活，让人看到清洁女工的辛苦与勤劳。瑛子还以细腻的感受披露了自己从开始的不适应、爱面子，到后来坦然面对的心理过程，以及熟悉后姐妹间的彼此关爱和相互温暖。她还通过自己在劳动间歇的观望街景和今昔联想，写到了东莞虎门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和快速发展，以及这种变化与发展给自己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这让人们看到，作者心怀大世界，有着超越身份的胸怀与向往。可以说，当瑛子写出《擦亮高楼》这部作品之后，她也以此“擦亮”了自己的人生。

“石头在我心目中是有生命的，是能呼吸的生命。”这是曾为民反复强调的观点。在大多数人眼中冰冷坚硬的石材，在他笔下获得了心跳与体温。比如，“感谢结石/用一种疼痛/叫醒了我/身体深处的/火山”（《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那些不成材的石头/是幸运的/它们终老在南山/小草伏在膝下/没有进一步的忧伤”（《那些不成材的石头》）；“一块石头奄奄一息/直到敲开一角，他才苏醒过来”（《记一次售后服务》）……甚至，他把自己自拟为一块石头，“不成形，不受力，喜阴，没有安全感/仍残留着一身文人的风骨/情愿在潦草的文字中潦倒一生”（《我躲在石头的后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徐刚表示，诗集《赶石头的人》中反复出现关于石头的意象。但这些石头不是作为劳动生产资料的石头，而是诗歌化的、隐喻化的、美学化的石头。所以，“荒料”“堆场”“边角料”等意象，具有了很多自况式的隐喻。这其实和很多专业作家的写法有类似之处。实际上，曾为民1995年就开始写诗，有着漫长的写作史，他的作品体



“新大众文艺丛书”，温雄珍等著，花城出版社，2025年12月

现出“素人不素”的写作特质。

易翔是湖南人，曾在东北师范大学读了7年书，现在是东莞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他说：“作为这座朴实而又有朝气的城市的‘两亿分之一’，我已经把自己融进她的自然山水和人间烟火里，东莞成为我重要的写作地理和素材。在东莞写诗，对我来说已然是一种幸福。”因此，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东莞时间》，整部诗集以“在地性”的观察为起点，逐步延伸至对自我、时间、自然与人伦的深度思考，展现出一种质朴而深刻的美学品格。北京大学副教授丛治辰表示，尽管被归为“素人”，易翔则经历了漫长的文学训练，具备很强的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的能力。他关注生活的细节，譬如孩子蹦跳扬起的灰尘、家庭晚餐的碗筷等，并从中提炼厚重的诗意。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热爱与转化，尤其体现在亲子题材作品中。在艺术上，易翔的诗歌具有独特的戏剧感与深层哲思。他擅于在平淡叙述中制造转折，通过场景折叠揭示生活背后的复杂逻辑。这种戏剧性不仅增强了可读性，更承载着作者对人和现实的深切体悟。

从故乡渔村到都市生活，从历史传统到当下现实，沈汉炎渴望将更多的内容纳入自己的笔下。在诗艺上，他既倾心于古典诗歌的凝练，又对现代诗的先锋表达抱有好奇，执着于探索如何把传统与现代更好地融合起来。在整理诗集《有些光不会消失》时，他想到的词语是“锦灰”，即希望在往昔的灰烬中“堆”出新生活的锦绣来。在离散中寻找皈依，在伤痛中点亮烛火，沈汉炎希望这本诗集能够成为自己从乡村“穿越”到城市的精神备忘录。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项静认为，沈汉炎的诗歌显示出很高的成熟度。其抓取意象、遣词造句与结构驾驭等方面的能力，“不是一下子能够习得的”，而是拥有长期的写作经验。沈汉炎善于对细节进行提纯，比如，《驻世诗人》中的“拿他人的死/来哭自己的活”一句，道出了哭丧人的生存之道。同时，沈汉炎还注重把握“克制”与“留白”。比如，在关于母亲的《惠清》一诗中，诗人写道：“惠清来了/放下我，便走了/在这个贫寒的世界里//惠清来了，亲了我/又走了。在深夜的梦里//惠清又来/笑着对我说：不走了/在我的文字里。”诗作在非常克制的表达里容纳了悲苦，留出巨大的想象空间。

作为体育教师，章新宏希望自己的学生从“全民健身”走向“全民写作”。他在学校里办校报《新苗》，带头创作文学

作品。他说：“我是教体育的，就是往前看、往前冲。”在写作上，他亦是如此，碰到有趣的事，想起有意义的人，就记录在手机里。随着时间的发酵，很多文字就慢慢地流淌出来。暨南大学教授张丽军说，章新宏的散文创作整体上具有清新、质朴的特质，文气充沛、情感真挚。其作品成功地将历史与现实、地理与人文、城市与乡村、个体与群像有机融合起来，集中呈现出一位东莞体育人对历史、现实与人文的思考。作家着力书写自己与东莞这座城市的相遇，通过个人奋力拼搏的体验，建构了异乡人与新城市的情感联结，并从中折射出时代的精神气象。同时，他通过书写故乡风物与童年记忆，建构了深厚的乡愁情感。这种从异乡到新故乡的情感流动与双重归属，精准捕捉了当代迁徙者的独特情感结构。在艺术表达上，章新宏的语言因为创作主体的丰沛情感而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在每一场关于东莞“新大众文艺丛书”的交流中，如何看待“素人写作”的命名，始终引起大家的讨论。广东省作协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认为，这些写作者满怀对文学的深情，对写作始终抱有小心翼翼的态度。他们的每个文字，真是用自己的心血、汗水来“赢得”的，所以，他们的写作是从生活中来、从生命中来、从灵魂里面发出的。这样的生命底色，这种去掉伪饰的写作态度，是我们要始终珍惜的。但是，写作者不能被标签框住，还是要真正回到作品本身。写作写到最后，读者不会管你是“素人”还是“绘人”，他只关心你的作品好不好。《作品》主编王十月说：“因为这个标签，我们才被看见。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标签被看见了，享受了这个标签带来的好处，然后又觉得这个标签对我形成了遮蔽。一个真正有追求的或者有能力写的作者是不会被这些标签所左右、所困扰的。所以，我的经验是，把这个标签当成我们身上的一个胎记，既不用回避它，但是也不用刻意地向别人展示说，‘来看啊，我的身上有一个这样的胎记。’”

专家们表示，在这套“新大众文艺丛书”中，很多作者在表达上需要更加考究一些，比如，慎用一些套话和成语，作品的结尾不要强“上价值”，要更加注重细节的描写而不是直接下判断或者抒情等。因此，一切都必须回归写作自身，正如温雄珍在《在水与火之间你选择了火》一诗中所写的，“唯有往火里，再添一块炭/让火焰再高些/再高些”。

2026年1月26日 星期一

■百家品书

# 烟火诊所里的医者仁心

——评周喜俊长篇小说《良医》

□杪 杪

由于网络文学、影视剧和网络剧的“齐心协力”，这些年医疗题材作品流行度颇高。从生活源头上看，这一现象与大众对健康的日益重视有关。在这些作品中，叙事的着力点各不相同，带给受众的接受体验也不同，由此展现出社会对医生这一职业形象不同的想象。周喜俊的长篇小说《良医》以基层中医诊所“赋春堂”为舞台，塑造了以杨悦欣为核心的“平民医者”群像，在人物成长、生活取材等方面进行了差异化的选择，堪称一部专属于普通人的医疗文学佳作。

在朴素的伦理中共情。与同题材作品相比，《良医》的情感视角落在日常生活伦理上，表现为跳出体制、规则等的限制而回归互助互爱的淳朴道德中。《良医》里发生故事和展现医德的场域，是遍布大街小巷的基层诊所。这里没有复杂的科室架构和看病流程，从病友们在候诊区的长椅上交流求医经验到杨悦欣在大雪天加号为急症患者看病到深夜，充盈着“能帮就帮”的浓淡善意。正如杨悦欣说的“见不得别人难受，不管走到哪儿，看着谁不舒服就想给人治”，这种看病的理念更像是邻里互助。

《良医》的核心是医患之间的共情。杨悦欣之所以能够成为“良医”，不仅因为她精通针灸和号脉，更因为她曾是嗜睡病患者，所以她懂得病人的情感需求。这让她给怕扎针的孩子编儿歌、教会家长基础针灸知识等情节有了逻辑上的根据。《良医》实际上重新定义了“良医”的标准，比起那些严格执行诊疗程序的“技术大神”来，普通人也许更需要“懂得我的痛苦”的人。

《良医》里的温暖，还体现在医疗领域里的师徒关系上。在反映中医世家生活的《大宅门》里，白景琦在交接秘方的时候靠着家族的权威对白占元进行“压制性”的传承，白占元一方面逼迫祖父上交秘方，另一方面又是被动接受。《良医》里的医术医德传承是通过精神接力来表现的，李世博在传给杨悦欣“望闻问切”的要领时，也将“医者菩萨心”的信念传授给她。师徒二人没有竞争、没有替代，更像是师傅点燃一盏灯、徒弟再把灯传下去，可以说写出了中医的精神实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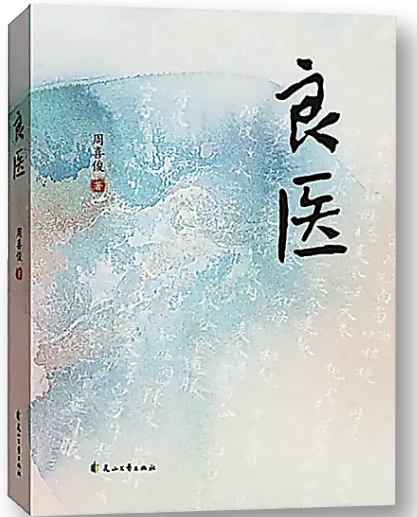
在日常生活中取材。在常见的医疗题材书写中，由于要考虑戏剧性，重症案例以及医患与现实规则、秩序的冲突是吸引读者的主要情节，这些内容虽然能够增强作品的叙事张力，但也疏远了读者，因为大多数人很少有这样的经历甚至见闻。《良医》中所写的不仅是大众日常求医的经历，病症也是常见病或与生活有关，比如，“我”童年偷吃生麦粒导致积食，梁冰玉因为婚姻创伤引发身心疾病。这些问题都是普通人可能遇到的，读者可以在病例中看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这种代入感是虚构重症的作品无法提供的。从生活现场取材的写法让作品充满真实感，作者也通过这些疾病的诊治还原了中医里所包含的生活智慧。

在对日常病痛诊治过程进行描写的时候，《良医》以社区诊所为窗口，写活了百姓求医问诊和基层医疗工作者诊疗工作的日常百态，充满厚厚的烟火气。很多令人感动的场景过目难忘，比如，农民工郑旭东在建筑工地干活时，右臂被钢筋划伤，为赶工期只简单包扎，没想到伤口逐渐化脓。他去大医院就诊，医生说“必须截肢，否则毒素扩散会要命”，可他一年没拿到工钱，连住院押金都不够，而且他还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要是截肢，“全家就塌天了”。到了赋春堂，杨悦欣没有收他一分钱，还帮他保住了胳膊。再比如，王小梅的故事，这个留守儿童因为被歧视而重度抑郁，吃了大半年药却始终未有好转。杨悦欣通过针灸让她回归了正常生活，这些病例在证明中医疗效的同时，也通过人物背后的故事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的百态，让杨悦欣的“医者仁心”得到了更细腻地表达。

在大众审美的视阈中叙事。常见的“医学流”作品以医疗行业的运作本身为呈现的内容，这容易使小说脱离“人”的轴线而转向“事”的讲述。《良医》采用更加偏向大众审美的叙事，达到了通俗性与思想性的平衡，既满足了大众对“好故事”的期待，又传递出善良的人性关怀。在叙事结构上，《良医》采用单元式的故事来构成人物的成长主线。杨悦欣从患者到医者的自我救赎和中医的传承构成了全书的主线，而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则采用了单元化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着从患病到求医再到治愈的过程。每个单元故事独立完整，有自身的起承转合。但这些故事又不是信手拈来、随意编造的，而是服务于主线：杨悦欣通过治愈不同的患者，她的医术和心态不断成长，中医的价值也不断得到彰显。这种结构让作品始终紧扣“医疗与人性”的核心。

在语言上，《良医》大量使用生活口语。除了增加阅读的亲密感外，对于普及专业的中医知识也不无裨益。李世博用“水缸有裂缝，不管往里边加多少水也得漏光，只有把裂缝堵上，才能保持缸内的水不往外渗”，比喻造血功能的重要性，把高深的理论化成了日常的话语。患者之间的对话更是充满生活气息，韩丽颖说“高血压对杨大夫来说是小菜儿”，王永刚调侃说“我这腰疼病，按摩、拔火罐折腾好多天，没想到你一针就好”。这种口语化的语言让中医文化变得通俗易懂，让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的读者都能轻松阅读，真正实现了“大众性”的美学追求。

尽管《良医》在题材和结构处理上还有不少问题，但它让文艺作品中常见的医疗精英“回”到了基层诊所，通过一个个普通患者、一段段治愈的故事，让读者感受到中医的智慧和人性的温暖，也让“良医”的形象成为每个人心中对善的期待与向往。这种“扎根生活、贴近大众”的创作，为医疗题材作品提供了新的创作方向。（作者系中国小说学会理事）



《良医》，周喜俊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25年8月

# 一种“有度”的批评方式

——评《春风有度，洞见思想：新时代文学研究辑录》

□岳凯华 杨映雯

在今天的文学批评场域里，人们往往走得太快：理论更新得快，观点表达得快。袁姣素的评论集《春风有度，洞见思想：新时代文学研究辑录》之所以值得读，在于它以一种不急不躁的方式提醒我们：批评的根本仍在阅读本身，在于理解作家的声音、倾听作品内部的节奏。袁姣素的评论特点兼具学术的理性与文学的色彩，带有始终如一沉稳与澄明。她的文字既能贴近作家的写作生命，又能在现实与审美的互动中保持思考的清晰。正是在这种姿态下，一种“有度”的批评方式悄然形成。

文学现场的自觉坚守。袁姣素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对作者的创作节奏、刊物的运作逻辑、写作者的成长环境等都有切身体悟。这些经验凝聚成一种敏锐而可靠的判断，使得她的批评建立在真实的阅读与长久的实践观察上，展现出浓郁的“在场感”。

该书最突出的特征是以作家论为结构单元，开篇即以大规模的阎真研究作为整体的逻辑：从青年女性形象的文化结构，到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叙事，再到时代浪潮中人物的价值判断，乃至阎真在《小说艺术讲稿》中呈现的写作观念，如此构成了一个高度连续的批评群落。这种从作家本体出发的研究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理解文学如何发生”的方式，作家论的价值也正在于此。书中谈及王跃文的叙述兼具古典美感与时代气息，刘克邦的散文保存着朴素、厚重的生活理趣，周伟的乡土描写让人感到土地深处的呼吸……以这种方式深入文学现场，更像与写作者一同前行，批评的立足点变得更加踏实、更加清朗，也增强了读者理解作品的准确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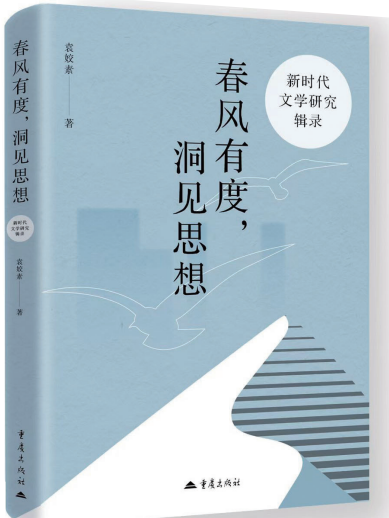
湖湘文学的着意剖析。该书另一重要维度在于对地域文学的长期关注。湖南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具有特殊地位，从20世纪以来的湖湘文化传统，到新时期

文学中的先锋、改革、乡土等多重写作力量，湖南文学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表达欲望与文化自觉。

袁姣素在书中对湖南作家群进行着持续跟踪与研究，对湖湘文化的考察有着独特而新颖的观点与经验表达。在她的批评中，湖南的山水、人情与生活方式构成了丰富的经验场，韩少功、龚曙光、沈念、谢宗玉、纪红建等作家呈现的地方性情都体现出一种来自土地的语言力量。对于作者而言，地域并不限于方位或地名，而是一种文学主体的生成方式：人在熟悉的土地上确认自身的坐标，文学在地方性的沉积中积累记忆，文化在乡村日常的细微处悄然成形，并在微弱的波动里呈现自身的轮廓。

现实审美的兼容并顾。文学批评要具备持续生命力，常常取决于批评者如何处理现实与审美的关系。袁姣素的批评强调“现实提供重量，审美赋予形态”。她所理解的现实不是抽象的社会议题，而是人物具体的精神处境。阎真的知识分子书写、王跃文作品中面对时代变迁的心绪、马笑泉小说里的生活张力、姜怡斌叙事中的日常困惑，都让她看到个体在时代结构中的挣扎与探索。这些观察带有同理心，也具有分寸感，呈现出作品内部的精神理趣。与此同时，她也不放弃审美判断，注重语言的质地、句式的呼吸、叙述的节奏、意象的亮度。在她看来，文学的力量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之中。她对湖湘文化的有容有度、古典气息，在场的意象牵引、精神守望等，都有着独特而精准的辨析。其现实关怀与在场感受共同塑造一种审美路数，让读者看到每部作品都是独立的生命体，充盈着不同的内涵与能量，也让批评不陷入空洞的概念，不流于情绪化议论，始终保持着从容的力度与内里的鲜活。

可见，该书不是概念的框架化，也不是批评的激烈化，给人的是一种持久的踏实感。它提醒我们，文学批评可以



《春风有度，洞见思想：新时代文学研究辑录》，袁姣素著，重庆出版社，2025年7月

将高深的理论在文本中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评论家需要坚守立场，遵从自我，以准确的判断力在作品的语言、人物与情感中持续深入，梳理出文本意义。袁姣素的批评方式就是这般朴素而有力量，她相信作品自身的张力，也相信文学始终与现实保持着紧密联系。在一个节奏不断被推快的时代，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读作品、写评论，本身就是对文学稳妥的守护。

（岳凯华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映雯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